

· 哲学传统研究 ·

哲学的实现：马克思、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

[加]安德鲁·芬伯格/文
王彦丽、葛勇义/译

摘要：贯穿于马克思早期著作中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卢卡奇、科尔施、布洛赫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特色构成一种趋向——实践哲学。哲学的“实现”依赖于实践哲学，元批判是实践哲学的基础。马克思早期著作把元批判观点限定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卢卡奇的物化概念是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最初基础，理性的元批判是法兰克福学派和早期实践哲学之间最重要的联系。在当代，技术的批判理论拒绝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局限于政治经济学领域，从对理性的一般性批判，转化为对技术和技术学科的实现形式的批判，更新了实践哲学。

关键词：实践哲学；哲学的实现；元批判；技术的批判理论

中图分类号：B8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0047(2017)05-0051-13

一、导论：元批判

1844年，马克思写道：“哲学只有取消无产阶级才能实现，而无产阶级只有哲学实现了才能取消。”^①阿多诺后来评论说：“曾几何时，哲学似乎过时了，但由于

作者简介：安德鲁·芬伯格，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信息与传媒学院教授、加拿大技术哲学研究会主席。

译者简介：王彦丽，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葛勇义，安徽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此翻译成果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7BKS041）阶段性成果、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3C060）阶段性成果，并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① K. Marx,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in *Karl Marx: Early Writings*,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T.B. Bottomore, London: C. A. Watts, 1963, p.59. K. Marx, “Ökonomisch-philosophische Manuskripte aus dem Jahre 1844” in *Geschrieben von April bis Aug. 1844*.

人们惦记着何时去实现它，所以它一直活着。”^① 哲学的“实现”这个前所未有的概念——意味着什么？对于这个问题，我在《实践哲学：马克思、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一书中给予了更加详尽的解答，本论文的目的是对此问题及其解答加以概述。^②

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使用“实践哲学”这个短语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代码。这意味着葛兰西已经按照马克思带头进行的特定阶级世界观基础上的文化语境解释马克思主义。葛兰西称之为“绝对历史主义”。它标志着马克思早期著作中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卢卡奇、科尔施、布洛赫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特色。我将把这一趋向归于实践哲学，以区别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其他解释。

实践哲学认为，基本的哲学问题实际上是社会矛盾的抽象化。这些矛盾貌似无解的现实问题，反映为文化困境。哲学视之为理论悖论，它们是思想家们搜尽枯肠却无法得出令人信服的答案或共识的无解难题。它们包括事实与价值、自由与必然、个体与社会、主体和客体等二律背反。因此传统哲学是一种无法意识到自身状况的文化理论。实践哲学却认识到自身是文化理论，并相应地把这些二律背反解释为社会矛盾的抽象形式。

这一论点包含两层含义：一方面，哲学问题是重要的，因为它们反映了真实的社会矛盾；另一方面，哲学不能解决它所确定的问题，因为只有社会革命才能消除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正如马克思在他关于费尔巴哈的第十一个提纲中所提到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③ 然而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实践哲学所设想的包括自然和社会的变化，正引发新的令人困惑的问题。

这个争论最完备的版本是卢卡奇的“资产阶级思想的二律背反”的概念。黑格尔声称，哲学的根本任务是克服二律背反，调和矛盾的两极。卢卡奇接受了黑格尔的观点，但他认为这不是一个思辨的任务。资产阶级思想二律背反源自资本主义实践的局限，即个人主义偏见和技术导向。卢卡奇把这种实践所创造的世界称为“物化的”。这个二律背反不能在理论上解决，而只能通过去物化实践这种新形式。卢卡奇的观点凸显了马克思早期的贡献，并解释了法兰克福学派创建“批判理论”的后续尝试。

关于事实与价值的二律背反。自从科学理性取代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哲学领

① T.W. Adorno, *Negative Dialectics*, translated by E.B. Ashton, New York: Seabury, 1973, p.3; T.W. Adorno, *Negative Dialektik*,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Verlag, 1966, S.13.

② A. Feenberg, *The Philosophy of Praxis: Marx, Lukács and the Frankfurt School*, London: Verso, 2014.

③ K. Marx, "Theses on Feuerbach," in *Writings of the Young Marx on Philosophy and Society*,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L. Guddat and K. Guddat, New York: Doubleday, 1967, p.402.

域关于这个二律背反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尽管其在自然领域的存在空间日益逼仄，大多数当代哲学家依然试图理性化地为道德价值辩护。实践哲学家认为这个过程受到误导。根本的问题在于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理性及其相应的现实概念的主导型理解。科学是这些哲学范畴的范例，但这些哲学范畴有着市场关系结构和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社会背景。在这个语境下，价值是屈从于漠视人性的经济规律所蕴含的现实的对面。卢卡奇总结了这一困境：“‘应该’预设了‘应该’范畴在原则上始终无法适用的一个存在，这一点在康德哲学获得的纯粹经典表达里仍然是正确的。”^① 尽管到目前为止，论证似乎表现为相对主义和还原主义，但卢卡奇得出了令人吃惊的结论：社会现实的转换能改变理性的形式，从而解决二律背反。

我把这称为元批判观点，这种观点采用事实与价值的抽象概念，把这些概念安置在其产生的社会根源中，然后在这个层面上解决二者的矛盾。这种方法应用于对所有实践哲学都构成其基础的主客体的二律背反。这种观点包含三个环节。

第一个环节，主体的哲学概念，经过社会学意义上的去升华，离开它的先验我思的唯心主义界定，被重新界定为活生生的、劳动的人类。这一步始于费尔巴哈对理性异化的最初批判：“在彼岸的世界为宗教存在的，在此岸的世界为哲学存在。”^② 现实的主体必须揭去神学的面纱才能消除哲学理性的异己化。

第二个环节，按照唯心主义哲学认知主体—客体关系的结构，将已被去升华的主体与客观世界的关系重新概念化。这种关系归结为主客体的同一性概念，以保证统一于理性。这个环节在实践哲学中表现为多种形式，从马克思对需求的本体论阐释到卢卡奇的“历史的主客体同一”，再到后期法兰克福学派的关于人类与自然参与式互动的概念所隐含的逐渐弱化的同一。

第三个环节，通过计划一场去升华术语之间关系的革命来解决该语境产生的二律背反。革命作为一种哲学方法，取代了自笛卡尔以来的现代哲学所采用的思辨方法。

这种意义上的元批判是实践哲学的基础，而且依然能够预告我们关于社会和哲学转型的思考。对这种转型的不同规划，区分出我将要在这里讨论的四位哲学家。他们通过自身所处的特定历史条件发展元批判观点。这些条件的不同解释了他们之间的许多不同，因为实践哲学依赖于历史环境，即他们写作时对二律背反的（或多或少合理的）革命性解决。

^① G. Luká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translated by R. Livingston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71, p.160. G. Lukács, *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ßtsein*, Berlin: Hermann Luchterhand Verlag GmbH, 1968, S.344.

^② L. Feuerbach, *Principles of the Philosophy of the Future*, translated by M. Vogel, New York: Bobbs-Merrill, 1966, p.70. L. Feuerbach, *Grundsätze der Philosophie der Zukunft*, Stuttgart: Fr. Frommanns Verlag, 1922, S.90.

二、马克思的实践哲学

马克思早期著作首先提出一贯的实践哲学。其写作是在一个落后社会中无产阶级运动初现端倪之时，那个社会拥有精致的哲学文化。在那个时代状况下，人们欢迎关于未来的各种思考。他规划了一个全面革命，不仅转变了社会形态，也改变了人们的经验和自然界。他把现代科学看作异化的并加以拒绝，提出一种统一历史和自然的新科学。马克思认为，“这将会是……一种唯一的科学”^①。这种不切实际的猜想让位于其后期著作中对资本主义理性的科学分析，这种分析将该元批判观点限定在政治经济学领域。

早期马克思通过革命寻求二律背反的解决之道。他的作为自然存在的主体概念、由劳动彰显的人类能力的客观化观念以及克服资本主义异化的革命观念和元批判的三个环节相对应。从这个视角看，《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一个具有规范性维度的历史本体论。它们承诺哲学在社会现实中得到“实现”。

马克思的观点始于对革命在政治哲学中地位的分析。在当代，革命已被证明是合理的，这种合理性证明建立在现存政府是人类幸福的障碍或认为它侵犯了基本权利的基础之上。这些观点被认为是革命的“目的论”或“道义论”基础。马克思提出一个原创的道义论基础——“理性的需求”。唯心主义最初将这些需求构想为解决思维和存在、主体和客体的二律背反。

早期著作对此观点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马克思从资本主义国家的公民道德和市民社会的经济需求相对的二律背反出发。公民和人两种身份由完全不同的、相互对立的动机所驱动，前者由普遍律所驱使，后者则是由个人利益所驱使。理论的第一阶段，马克思表明了超越这一对立的重要性，但没有解释如何协调需求并使之普遍化以消除其竞争本性。接着，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是革命的代理人，肩负着解决公民与人的二律背反的任务。但是这一观点引发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无产阶级）实践之间新的二律背反。现有的无产阶级运动和马克思的规划有什么关系？哪种实践的、物质的动机将符合马克思哲学的目标？观点的第三个阶段用对理性和需求的二律背反的元批判性解构回答了这些问题。

理解马克思手稿的关键在于这些手稿对需求的根本上的再定义，即把需求定义为与现实之间的本体论基础上的关系。马克思写道：“人的情感、激情等等，不仅仅是狭义上的人类学特征，而且是存在（自然）的真实本体论界定……”^②如果需求

① K. Marx,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p.164.

② Ibid., p.189.

比知识更为基本，那么唯心主义哲学所宣称的存在起源于思维主体这一命题将被推翻。

但是马克思并没有简单拒绝唯心主义的构想。在他的本体论叙述中，需求不是碰巧和满足的自然形式相关，而是和自然界的本质的相互关系。这种相关性存在于劳动，劳动在满足需求的同时把人的能力客观化于自然界。这是主客体的“真正的”同一。这在功能和形式上与唯心主义的主客体认知同一相类似。把主体需求从市场规律中解放出来既满足了理性的需求，也为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革命性批判打下了基础。这些二律背反在历史中得到克服，不仅包括马克思的首篇有关政治的论文中出现的人和公民的二律背反，也包括本体论基础上的主客体的二律背反。“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本主义。”^①

然而这是一个合理的断言吗？唯心主义哲学的目标是通过展示主体对客体的建构来证明主客体的统一。如果主客体被重新界定为自然存在物，这个抱负会怎么样呢？在实践哲学的语境中，产生了一个新的关于社会和自然的二律背反：一个活生生的社会主体能否构成自然？马克思的手稿给出了肯定的回答：通过劳动，自然被还原为人类产品；在劳动不起作用的地方，通过感觉，自然被理解为社会共同认可的。因此，从一个特定的人类维度构建了客观世界。“人自身变成了客体。”^②

然而可以确信的是，自然先于人类存在，而且自然的存在并不依赖于人类。自然科学研究的是显现为真实实在的独立的自然。如果是这样，历史就成为宇宙的一个并不重要的角落，人类也仅是没有本体论意义的自然事实。

因此，自然主义从一开始就是实践哲学的核心问题。马克思挑战自然主义，认为如果你想象自然独立于人类，你就想象自己不存在。总之，独立于人类的自然是一个无意义的假设，不是一个具体的实在。马克思因此拒绝作为神学概念中非实体化主体残余的“本然观点”。他提出了我所说的“认识论无神论”。他的自然概念不同于现代自然科学中的自然，他把这种自然科学作为一种抽象加以拒绝。他构想中的自然，是在需求中被体验的，被社会化的感觉所感知的，是在劳动中被把握的（自然）。这种生活化的自然具有自然科学本质所缺乏的历史维度。因此，马克思要求创造一种活的自然的新科学。

新科学的概念只有在客观知识本身发生改变时才有意义。马克思和以后的卢卡奇、法兰克福学派力争的一个新概念是霍克海默称之为“思想的界限”的概念。“既然超乎历史，因此夸大源自某个纯粹无限思想的真理概念是不可能的，从而通

^① K. Marx,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p.157.

^② Ibid., p.161.

过上帝的概念所做的最后分析,它不再使把我们拥有的知识导向这种不可能性有任何意义,在这个意义上称真理为相对的。”^①知识起源于“有限视域”。它基于主体的社会情境参与,而不是超然于客体。

三、卢卡奇的物化概念

尽管卢卡奇的实践哲学版本与早期马克思很相似,但他主要还是受马克思后期作品的影响。物化概念是卢卡奇最重要的理论创新。这个概念综合了韦伯的合理化观念、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批判以及他对工人与机器的相关性分析。虽然卢卡奇通常回避“文化”这个词语,然而通过这个概念,他实际上提出了我们所谓的资本主义文化批判路径。这种批判是在新康德主义和黑格尔逻辑著作中得到陈述的,但其最基本的假设是马克思主义观点所认为的资本主义不能完全掌握和管理自身的存在条件。因此,物化概念是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最初基础。

文献中关于物化的意义含混不清。根据其词源学,“物化”是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原为物之间的关系。在这种语境下,“物”这一词语具有特定的含义:事实性知识和技术控制的客体。正如卢卡奇所理解的那样,物化是把科学—技术与自然的关系一般化为一种文化原则,这同样适用于作为整体的社会。在这个意义上,它通过一种特定的信仰模式和实践模式建构社会。物化并不因此是一种精神状态,而是一种构造社会和意识的文化形式。

卢卡奇如此总结其理论:“重要的是清楚地认识到,所有的人类关系(作为社会行为的客体)越来越多地采用自然科学概念系统的抽象因素,即自然规律的抽象基础的客观形式。另一方面,这个‘行为’的主体同样越来越多地对这些(人为抽象)过程采取纯粹观察者的态度,即实验者的态度。”^②物化因此是资本主义的可理解性原则。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偏见或信仰,而是一个社会世界的构成性基础。

由于写作于具有侵略性的社会合理化过程威胁性地压倒欧洲之时,卢卡奇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分析理解为科学技术的现代概念的范式和来源。资本主义的经济局限表现为存在于每个领域的理性局限。这些局限与卢卡奇所谓的“形式主义”有关。这个问题,卢卡奇认为,不在形式主义科学理性本身,而在于其应用超越了自然界的界限(即它的适用对象),而进入社会的范围。

物化经济理性在一定程度上是形式的,它是从具体的定性内容抽象化为定量化

① M. Horkheimer, “On the Problem of Truth”, in *Betwee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translated by G.F. Hunter, M.S. Kramer, and J. Torpe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5, p.192. M. Horkheimer, “Zum Problem der Wahrheit”, *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 Vol.4, No.3, 1935, S.336.

② Luká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p.131; Lukács, *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ßtsein*, S.310.

的决定形式，例如价格。形式 / 内容的辩证法可以以作为售卖劳动力的工人的抽象经济形式和工人的经济概念界限之外的具体生活过程之间的矛盾加以说明。“剥削的数量上的差异对资本家来说，是他的计算对象的量化规定形式；对工人来说，则是他的整个肉体的、精神的和道德的生存方式的决定性的、质的范畴。”^①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张力不仅仅是概念上的，并且会导致危机和革命。物化理论因此在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和 20 世纪早期资本主义社会日益加剧的文化和哲学危机之间建立了一座桥梁，卢卡奇将所有这一切都归于对现代理性的形式特征的影响。

卢卡奇通过哲学的历史批判发展了这个论点。物化思想，正如康德所例示的，总体上采用科学—技术和自然的关系作为主体—客体关系的模型。但是科学规律是从特定的对象（时间和空间）抽象出来的。如果理性像这样以科学为范本，就失去了许多内容。随着康德普遍化形式和内容的矛盾，物化形式理性产生了它无法完全包含的相关内容。没有进入形式概念的余数的内容表现为物自体。主体和客体的二律背反将认知主体和终极实在分开。

康德的纯粹理性、实践理性和审美判断的三大批判和德国古典哲学中三种尝试相关，这三种尝试试图解决理性的形式化概念的二律背反。理性的三种诉求起源于这种“哲学经验”：实践原则（只有一个实践主体能克服形式和内容的二律背反）；历史作为现实（只有在历史中，实践在本体论层面才有效）；辩证法（辩证法克服了把理性解释局限于形式定律的界限）。卢卡奇说明了后康德哲学所做的努力，并将这些结合起来，以迎合马克思主义最终追求的需要。

卢卡奇认为，马克思主义对理性概念的反升华元批判使解决德国古典哲学的二律背反成为可能，不仅包括社会的二律背反如事实与价值、自由和必然的矛盾，也包括以物自体为例证的本体论层面的主客体的二律背反。通过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来解决这些矛盾，结束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的客观性形态的统治。革命，作为物化的实践批判，是元批判的第三个环节，它满足理性的要求。

但这个论据的意义是模糊的。无产阶级是作为一种形而上学的实体、作为存在于唯心主义中的一种构成主体、超验性自我的一种形式而出现在现存世界的吗？当代新康德哲学家埃米尔·拉斯克提出了一个逻辑理论，以帮助卢卡奇避免这个荒谬的结论。卢卡奇利用拉斯克关于意义和存在的区分来阐述他的抽象形式和具体内容的社会辩证法。资本主义结构提供的意义被强加于社会存在的内容之上。无产阶级在连续过程的某个阶段调和这些意义。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卢卡奇背离拉斯克：意义层面的行为影响生存水平。形式和内容必须在它们的“总体”的关系中一起得到理解。

① Luká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p.166; Lukács, *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ßtsein*, p.166, S.352.

卢卡奇称无产阶级为“同一的主客体”，因为对他们来说认知和现实是一体的。由被剥削个体组成的大众一旦意识到自身被物化的状态，无产阶级就会超越这种状态并通过集体行动改变自身和社会。“工人的自我认知带来认知客体的客观结构变化……在物的外衣下是人与人的关系……在数量化的外衣下是质的、活的核心。”^①我称此为“方法论”概念的革命。它没有使无产阶级实体化，也没有把具体化视为事物最后去物化状态的成果。相反，物化的制度和社会关系产生了从内部与物化形式斗争的集体主体。

这个理论是争议的永久源泉。其分歧和卢卡奇对自然和自然科学的认识尤其有关，因为在这里形而上学说明会导致最可疑的结果。我认为，卢卡奇在参考唯心主义修辞时背叛了自己，但事实上又坚持了更多的合理性的辩证观点。事实上，他否认自然“本身”是由历史实践构成的。这是不一致的吗？如果自然“本身”超越历史，无产阶级革命又如何解决这些二律背反呢？

卢卡奇生活在一个科学技术发挥重要作用的先进社会，他不可能像早期马克思一样设想完全颠覆它们。他必须找到一个更微妙的方法以革命性来解决主客体之间的二律背反。物化是一种客观化的形式。也就是说，是意义的先验条件。这不是一个精确的康德式的先验论，因为它是由人类在社会现实中制定的，而不是被一个不可能成为客体的抽象主体制定的。尽管如此，它在世界的可理解的水平上运行，即使在构成该世界的实践活动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将主体和客体的二律背反转移到这个层面，使它们和解成一个统一状态得以可能。

关于这些术语，主体不需要假定自然的物质存在来克服二律背反。相反，问题根据主体与自身所生活和表现的世界的意义系统的关系而重新制定。那种关系采用两种不同的形式——实际上是“方法”，即认知的和实践的（方法）。卢卡奇相当混淆地称之为设想物化事实和规律的自然科学的“沉思”方法。科学是沉思的，不是因为它是被动的，而是在一定意义上，它构成了不能被去物化实践所改变的形式规律系统。因此，物化自然是不可超越的。

对于社会制度来说，这种情况是不同的，因为社会制度从本体论上说可以由人类行为加以改变。社会的物化不是无法避免的宿命。社会制度可以通过人类行为在本体论意义上加以改变，修正其意义，改变其实际功能。这种“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的制度化将产生一种新型社会，卢卡奇（过于简洁地）描述如下：“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所面临的世界呈现出一种对象性，这种对象性——如果加以正确而透彻的思考和把握——决不会保持在一种和以前揭示的形式相似的纯直接性上，因此可以被看作是介于过去和未来之间的贯穿因素，这样一来，可以用它的一切范畴关系来

^① Luká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p.169; Lukács, *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ßtsein*, S.353.

说明，它是人的产物，是社会发展的产物。”^①要是他当时发展了这种深刻见解，他就会给我们一个社会主义的最初概念。

沉思和改造性实践之间的方法论区别是卢卡奇观点的核心。尽管是以不同的方式，但两者都是社会性的。知识的所有形式都依赖于历史上具体经验的先验结构。自然科学的本质是一种这样的文化形式的产物，沉思的形式因此属于历史，即使它设定一个超越历史实践范围的由事实和规律构成的世界。它的沉思方法产生关于自然的真理，但它在社会科学应用中是意识形态的。卢卡奇因此是通过其客观性的先验形式将科学包括进历史，而不是通过其事实内容的建构。自然和社会的二元论是方法论的，而不是形而上学的，它处于一个更大的社会框架内，因此满足了实践哲学的要求。

四、法兰克福学派

我现在来谈法兰克福学派。阿多诺和马尔库塞都承认受卢卡奇物化理论的影响。1932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使得马尔库塞从海德格尔的影响中解放出来。理性的元批判是法兰克福学派和早期实践哲学之间最重要的联系。与早期马克思和卢卡奇一样，这些哲学家赞同一种绝对的历史主义，它奠定了一种批判视角，对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资本主义文化所有方面进行批判。这个批判是对马克思异化概念和卢卡奇物化理论的直接传承。这些哲学家与卢卡奇争论，现时代的资本主义的经验建构在科学世界观中得到了体现。这种世界观的局限性在表征现代社会的合理化形式中得以体现。然而，他们拒绝了卢卡奇的许多关键概念，如整体的概念和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因此，在法兰克福学派中，实践哲学的历史主题主要是为社会批判提供了一个独立的观点。

阿多诺和马尔库塞在把卢卡奇推向共产主义革命浪潮之后写道，他们仍然相信实践解决哲学二律背反的必要性，即使所处的时代变得难以捉摸。这使他们的关注焦点从资本主义的具体影响转向不再产生阶级意识的现代经验结构的更一般问题。对扭曲经验的分析提供了对其未扭曲的对立部分将揭示的内容的一瞥。正如阿多诺所说：“真实的事物通过虚假的事物确定自己。”^②

法兰克福学派哲学家仍然相信，只有无产阶级才能解决这些悖论，但他们也声

① Luká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p.159; Lukács, *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ßtsein*, S.342.

② E. Bloch, "Something's Missing: A Discussion between Ernst Bloch and Theodor Adorno on the Contradictions of Utopian Longing," in *The Utopian Function of Art and Literature*, translated by J. Zipes and F. Mecklenburg,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8, p.12. R. Traub, H. Wieser (Hg.), *Gespräche mit Ernst Bloch*, Frankfurt a. Main: Suhrkamp Verlag, 1975, S.70.

称无产阶级不再是一个革命主体。随着《启蒙辩证法》的问世,焦点从阶级问题转移到对自然的统治和大众媒体的力量上。这本书中的工具理性概念类似于卢卡奇的物化概念,但从最初的马克思主义根源中解脱出来。本文批评这种工具理性,其资本主义形式表现为对自然和人类滥用的权力。

作者激发了反思理性的潜力,以克服物化并协调人类与自然。他们呼吁“留意(Eingedenken)主体中的自然”的立场,反对当下渗透至内在生活的反乌托邦工具。^①通过反思我们自身属于自然的自然属性,我们得到了未能领会的一个提示。这样做时,我们打破了资本主义形式对经验和将主体简化为社会机器中单一部件的强制压迫。关键不是要拒绝合理化和理性化的现代本身,而是要使它从统治的傲慢中解放出来。这将释放“人与物之间协定”的潜力,即和平——阿多诺将其定义为“没有统治的分化状态,彼此有区别的参与”^②。这接近于阿多诺试图确定的主体和客体的统一,但前景并不明朗。

阿多诺后来的同一和非同一概念概括了形式/内容的物化辩证法。同一思维是形式化的,同时也失去了由具体经验辩证法所捕获的内容。现代文化通过抽象概念“识别”经验化的客体使经验破产,这些抽象概念把经验归入思想并抹去更复杂的关联和可能性。辩证法揭示了使思想获得客体真理的语境和概念的“星丛”(constellation)。

阿多诺提出了“理性的合理性批判”^③。他承认工具理性的重要作用,然而他反对其在资本主义那里被高估的形式。例如,他认为机器既是资本主义统治的压迫性工具,同时也包含通过其客观形式为全人类提供服务的希望。“方法的类物性质使其普遍适用,它对每一个人都是客观有效的。它自身包含对使得思想产生其方法的统治的批判。”^④他提出了有关市场和其他现代制度的类似观点。

这个有趣的批判方法从未发展得超出简短格言的范围。我在我的技术批判理论中引入“形式偏见”的概念,这个概念将阿多诺观点的这一方面发展为一种批判方法,重点是保持现代制度的解放性内容,同时批评它们在资本主义中有偏见的应用。但是因为他拒绝所有革命愿景,阿多诺的实践哲学的版本导致了一条死胡同,这在他和霍克海默 1956 年关于实践和理论的对话中、在阿多诺面对新左派的不理解中得到了证实。

马尔库塞的实践哲学版本受经验现象学概念和新左派的影响。他认为 20 世纪

① T.W. Adorno and M. Horkheimer,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translated by J. Cumming, New York: Herder and Herder, 1972, p.40.

② T.W. Adorno, “On Subject and Object”, in *Critical Models: Interventions and Catchwords*, translated by H.W. Pickfor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p.247.

③ Adorno, *Negative Dialectics*, p.85.

④ Adorno and Horkheimer,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pp.29—30.

60年代和70年代的社会运动不是革命的新动力，而是预示经验的解放模式。原则上说，基于这种经验世界的新方式，革命在一个发达社会中是可能的。对于马尔库塞来说，这对于构建一个最终的实践哲学版本而言是足够的，在这个版本中科学技术的转变起着核心作用。从自然和人类的统治下得到解放，在黑格尔意义上，至少是一种真实的可能。马尔库塞因此得到比阿多诺更积极的结论，尽管他也找不到有效的变革力量。

马尔库塞的“二维”本体论接近阿多诺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像阿多诺的非同一性概念一样，马尔库塞的第二个维度包含了被现有社会束缚的可能性。但马尔库塞也借鉴了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生活世界的现象学概念，以及“工程”的存在主义概念，以阐述他对技术的批判。这些现象学概念被用来解释科学技术的存在缺陷的遗产和新左派的前景。资本主义的文明工程致力于技术统治，越来越将经验和知识限制于它们的工具性方面。

革命需要经验的历史演化的“先验”条件的转变。经验必须揭示其客体固有的潜力。马尔库塞指的是经验的“存在真理”，它类似于阿多诺的“星丛”概念。这个真理是“一种综合，是对在扭曲的人性及自然中发现的碎片的整合。重新搜集的材料成为想象的领域，这已经在技术中被抑制的社会合法化。”^①随着“新左派”及其“新感性”的出现，出现了一种新形式的经验，预示着这种已转变的先验（条件）。

马尔库塞对科学技术的元批判把科技与其在资本主义对人类和地球的剥削中的来源联系起来。“自然工程作为可量化的物质……将是一个被存留在科学项目发展中的具体社会实践的地平线。”^②他将法兰克福学派对于物化工具理性的批判与新左派以及后来的环境运动中出现的新的经验模式联系起来。正因为物化的“技术理性”源于资本主义的生活世界，这种新的经验模式也就承诺了一种根本上完全不同的理性。辩证理性将想象作为一种功能纳入进来。通过这种功能，事物的物化形式被超越。

如果这种经验的新形式被普遍化，自然和其他人类将被理解为非工具化的——如主体。与哈贝马斯的著名批评相反，这并不意味着对话的熟知性，而是承认客体作为一种具有自身潜力的物质的完整性。马尔库塞提出了“自然的解放”，“在自然界中恢复生命的增强力量，对于无休止的在竞争性表现中浪费的生命来说，感官上的美学特质是陌生的”^③。主客体将不再统一于观念中，而是通过对一个自然共同体的分享式参与而得到统一。

但是这里存有歧义：这种展望如何适用于科学技术？马尔库塞打算“返魅”自

① H. Marcuse, "Nature and Revolution", in *Counterrevolution and Revolt*, Boston, MA: Beacon, 1972, pp.69—70.

② H.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 Boston, MA: Beacon Press, 1964, p.160.

③ H. Marcuse, "Nature and Revolution", p.60.

然还是他的理论旨在改革技术设计?如同以往的实践哲学家,马尔库塞拒绝了自然主义。科学属于历史——“客观性(物理和历史)的两个层面或方面是相互关联的,也就是说它们不能彼此绝缘;只要‘绝对’物理层仍然存在,历史方面就永远不能消除得如此彻底”^①。因此,现代科学底层的历史的先验(条件),在一种新的经验模式的影响下,能够在未来的某个社会主义社会中进化和改变。这种社会主义受到经验的新模式的影响。

但马尔库塞基本的政治担忧不是科学,而是技术。科学不能通过新规律或社会安排被有效地改变,而这些正是技术转型的方法。社会主义将引入新的技术目的,“作为技术目的,将随后在工程和机器建构中运作,而不仅是在自身当中使用”。马尔库塞称之为“价值观转译为技术任务——物化价值”^②。革命能通过技术变革解决二律背反,使科学转型保持在科学学科在新社会背景的内部演化中。马尔库塞因此构建了实践哲学的最终版本,这正是我试图发展为更深层次的技术批判理论。

五、如今的实践哲学

马尔库塞的思想很大程度上适用于当代社会运动,例如从新左派发展出来的环境运动。这些运动解决了在经验教训层面的技术学科和设计的局限性。通常,这些教训基于批判主流路径的反专家者(counter-expertise)而产生。普通人——工人、消费者、污染的受害者——通常是第一个注意和抗议危险和滥用技术的人。在其他情况下,用户可以识别他们使用的系统的未开发潜力,并通过黑客打开它们。这就是互联网如何重新作为通信媒介而起作用的原因。

这些案例在实践层面例证了元批判的基础结构。理性的去升华采取理性技术学科的社会批判形式。马克思的“需求”、卢卡奇的“意识”和马尔库塞的“新感性”现在都被生活世界中的技术的实践—批判经验所占据。劳动和阶级,尽管它们一直很重要,不再在理论核心占有独一无二的位置。劳动是生活世界的一部分,在其中人们获得重要的经验,这些经验通过各种类型的社会参与和斗争与技术理性形式产生关联。但是,这里还有其他面对技术的方式,这些方式与技术学科和技术设计存在关键性的联系。

因此,通过对现代社会全范围物化的批判性强调,技术的批判理论拒绝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局限于政治经济学领域。这些不仅包括经济的物化,而且还包括管理和技术的物化、消费的物化和资本主义日常生活审美的物化。当然,管理、技术和消

①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 p.218.

② Ibid., 234.

费都受经济力量的控制，但它们不能简化为经济，这些领域的抵抗对于当代激进运动来说，并不比劳动斗争更缺乏重要性。

当代社会运动仅仅提供了一种更民主化的现代性结构的预示。马尔库塞对新左派前途的保守评价正好适合当前。社会斗争能够在理性和经验关系的可能转变上教会我们一点东西，但这与通过简单的外推来预测革命相去甚远。然而，我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超越阿多诺的系统悲观主义。

这种新形式的实践哲学是否能够解决“资产阶级的二律背反”，这个问题更加难以回答。早期的马克思、卢卡奇以及马尔库塞都曾雄心勃勃地预测，这种哲学范畴的去升华的原批判允诺了对二律背反的社会层面的解决。主体和客体，在唯心主义的概念中加以分离的主客体，在社会学术语中经过重新界定可以重新结合。尽管存在问题，将这种模式应用于自然始终是这个计划的关键之处。

对于自然和自然科学的社会说明似乎在今天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合理。科学技术研究中的总体性工作反驳了将理性与其社会背景分离的实证主义假设。但是如果在这种情况下重构理性，那么实践哲学可以建立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之上。从理性的一般性批判，到它的技术和技术学科的各种各样的实现形式的批判的转化，更新了实践哲学。

实践哲学作为在马克思主义中充分发展的试图对资本主义下的理性化社会影响的反思，对今天的我们而言是重要的。这是第一次从批判、辩证法立场提出关于科学技术的基本哲学问题，它攻击了资本主义，不是立足于它的弱点，例如不平等和贫困，而是它最强硬的一面——市场和管理技术的合理性、进步的观念、它的技术效率。但这种批判并不那么拒绝理性。相反，实践哲学敢于制定一个“合理的理性批判”，以此来标识现代性成就的缺陷，并在一个新的基础上提出一种合理的可选择性。

（责任编辑：韦海波）

Contents

- Philosophical Issues
 - 4 Several Issues of Informationalized Technocracy in the Ubiquitous Society *LIU Yongmou, LAN Lishan*
 - 18 Quantum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ts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s *WU Guolin*
 - 31 Reviews on the Risk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ANG Zhidong*
 - 40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on Human-Computer Relationship *CHEN Peng*
- Philosophical Traditions
 - 51 Realizing Philosophy: Marx, Lukács and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rew Feenberg*
 - 64 Marx's Thought of Social Power and Its Contemporary Meanings *PAN Le*
 - 76 Husserl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Other *MA Yinghui*
 - 88 The Three Issues on Yuan Dynasty Scholar Zheng Yu's Interpretation on *Chun Qiu*:
Based on *Chun Qiu Que Yi* *ZHANG Li-en*
-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on Modern Life
 - 101 Bernard Williams on Moral Relativism *WEI Benqun*
 - 117 The Quasi-realist Logic of Attitudes *ZHU Shiyong*
- Philosophical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133 From Mechanical Reductionism to Methodology of Information Ecology:
Successful Approach to Innovation for AI Theory *ZHONG Yixin*
 - 145 Three Paths of Social Shaping of Technology *ZHENG Xiaosong*
- Essays and Interviews
 - 157 On Consistency of Words and Deeds *TONG Shijun*
 - 164 "The Phenomena of 1977—1978" and My Way of Philosophical Research: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Yang Zebo *YANG Zebo, YANG Shaohan*
- Philosophical Events and Book Reviews
 - 180 Information Civilization in Contemporary Philosophical Vision: Summary of the 15th
Academic Forum of *Philosophical Analysis* *SUN Yue*
 - 189 A Worldwide Vision of Philosophy and Philosophy of Worldwide Vision: On Professor
Yang Guorong's Book *The Horizon of Philosophy* *YING Qi*